

**SOUTH - 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3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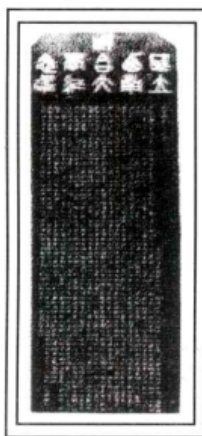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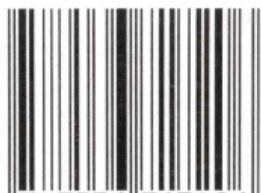
INSTITUTE OF HISTOR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P. R. CHINA

云南民族出版社

SOUTH - 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ISBN 7-5367-1720-2



9 787536 717206 >

ISBN 7-5367-1720-2

G · 275 定价: 18.20 元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福春

封面设计：葛伟征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③

云南社科院历史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9 字数 220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书号：ISBN7-5367-1720-2 定价：18.20 元
G · 275

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序

何耀华^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区的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经济的日益现代化是巨变的中心,而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习俗、艺术与娱乐等等)的急速变迁,则是巨变在精神领域中的表现。

在文化变迁中,学习西方优秀文化已成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共识。但是,对孰是西方的优秀文化的问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答案只有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去寻找。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按照小平同志在此提出的思想和标准,判断什么是可供我们学习的西方优秀文化,那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应该怎样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我认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必须以弘扬和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若不是这样,中国文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失去立足之地,更谈不上与西方文化争短长。因此,反对摒弃中国优秀传统文

^① 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化的“西化”，过去是，今天是，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和未来文化的取向。在这个宝库中，有许许多多有益于再创中国文化辉煌和世界文化辉煌的因素。以“修身立己为本”的因素来说吧，在《礼记·儒行篇》中，曾对作为人格的理想化模式，即做一个理想化的人作出规范，提出“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推贤而进，不望其报”、“慕贤而容众”、“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先劳而后禄”、“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程功积事，推贤而进之”等等的主张，这些规范自秦汉以来久兴不衰，而且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诸如此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文化宝库中的蕴藏是极为丰厚的，构建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它们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的基础之上。其次是撷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使它的独特性质更加得到发扬光大。只有这样，21 世纪的中国文化才能独树一帜，才能超越西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西南居住着 34 个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它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中国西南地域辽阔，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包含着对各兄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各地方性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创新。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的出版，就在于要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为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因此，《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作为构建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文化的根本取向，并给撷取西方优秀文化以正确的导向。

1996 年 4 月 12 日

目 录

中国古代的蛇信仰与稻作文明	霍 巍 (1)
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	方 铁 (32)
南中经济粗识	段玉明 (59)
历史上的滇藏交通	申 旭 (100)
宋朝两广交通简述	李桂英 (129)
云南近代城市的发展	牛鸿宾 (141)
中法战后的法国与云南	龙永行 (165)
西藏岩画初考	李永宪 (193)
西南苗族不同区域的乡土文化	颜恩泉 (222)
拉祜族的殉情事件研究	王懿之 (244)
从云南民俗文化看中国古代亲族关系之 社会结构	蒋文中 (256)
九寨沟的旅游与文化认同	[美] 彭文斌 (266)
	罗伦斯·埃卜斯坦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致语	(281)

Cultural Studies of South – western China

Content

Snake Belief and Rice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Huo Wei (1)
On the N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Pu and the Yue in the Times of Pre – Qin	Fang Tie (32)
An Outline of Nanzhong Economy	Duan Yuming (59)
Ancient Traffic between Yunnan and Tibet	Shen Xu (100)
An Outline of the Traffic between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 Song Dynasty	Li Guiying (129)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 in Yunnan ...	Niu Hongbin (141)
Yunnan after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1883 – 1885)	Long Yongxing (165)
An initial View to Tibetan Rock Paintings	Li YongXian (193)
Native Cultur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outh – western Miao Nationality	Yan Enquan (222)
A Study on Death for One’ s Love of the Lahu Nationality	Wang Yizhi (244)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Ancient Relationship through Folklore Culture in Yunnan	Jiang Wenzhong (256)
Tourism and the cultures of identity in Jiu Zhai Gou	Peng WenBin (266)
A Few Words from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South – western China	(281)

中国古代的蛇信仰与稻作文明

——中日稻作文明比较研究之一

霍巍

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古代的蛇信仰，曾经已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讨论，但主要的认识是将这种信仰作为中国古代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标志来看待^①。近年来，笔者与日本学者合作，对中日两国稻作文明开展比较研究^②，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系统考察与稻作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相关联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原始信仰体系，及其相关的礼仪风俗制度。通过笔者的研究，认为中日两国在稻作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蛇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水稻农业的祭祀活动有关，而不同于泛义上的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而且，这种信仰的起源及其向日本的传播，很可能与中国南方稻作文明圈有着密切联系。

一、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图像与蛇信仰资料

中国早期的蛇，与龙这种传说中的动物并无十分严格的划分，在古人的意识中，龙蛇常被视为同类，常常是龙蛇并称。如烛龙，从字面上理解应当属于龙类，但在《山海经》、《淮南子》

①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 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重点研究领域项目。

中，却被记载为“人面蛇身”的神灵^①。所以，过去一些被定名为“龙”的图像，实际上也包含了蛇的因素在内。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的一批被认为与“龙”有关的图像，虽然被考古学者定名为龙，但实际上它们常常与其它动物混生为一体，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如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出土的龙、虎图案，其中的“龙”摆放在人骨架的右侧，身体粗壮，并生有粗大的前后肢^②，更与虎、豹之类动物近似。陶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上所绘的“龙”，其形体与蛇接近，为长躯鳞身，方头，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即有龙蛇的某些特征，又有鳄鱼的某些特征^③，有人提出它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综合体^④。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的一件尊形器上，绘有猪首、蛇身、长有双翼的神怪动物，但它也不是单纯的对某种现实动物形象的写照，而是人们所创造出的已被神化了的动物^⑤。除此之外，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⑥、辽宁红山文化遗址^⑦等地出土的一批玉龙，虽然躯体弯曲如龙蛇，但头部都具有猪的

① 《山海经·大荒东经》、《淮南子·天文训》。

② 河南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基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④ 高伟等：《关于陶寺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等：《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⑥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⑦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特征，有人将这种神灵命名为“猪龙”，或者将其称为“龙形玉”，也正是因为看到它们与蛇或龙之间还存在有较大的差别。其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龙纹陶片、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看来基本沿袭了北方红山文化系统玉龙的造形风格，以突出的兽首为其主要的特征，仍具有猪龙之类合体神灵动物的性质。

中国南方史前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中，也出土过早期的“龙”的形象，如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陶器上，绘有所谓“龙形纹饰”^①，身体细长，头部硕大，具有早期蛇的特征。浙江余杭瑶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龙首牌饰”、“龙首璜”、“龙首镯”等玉器，身体与头部几乎等粗，其头部似蛇又似蛙^②，看来也是以两种以上的喜水性动物合成的神灵（图1）。

综上所述，我国史前时期的“龙”，形态并不固定，实际上是各个氏族、各个部落根据自己所信仰的神灵构想而成。过去对于龙的原形有各种意见，有龙为鳄鱼说，龙为马说，龙为猪说，龙为蛇说等等，事实上后世的龙是融合了各种动物并经过长期的改造逐渐形成的，各个不同的地域，早期的龙在形象上差异很大，正说明不同的原始集团对这一神物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在各种动物原形中，龙显然与蛇这种动物在形体上最为接近，所以它的基形为蛇这种可能性最大。有学者认为龙的原形最早可能是生活在南方深山沼泽中的蟒蛇，蟒蛇起初是某些南方氏族部落的图腾，在蛇图腾的基础之上演化为龙，逐渐为大多数氏族部落所接受^③。笔者认为，以蛇为“图腾”（Totem）与以蛇为信仰对象

①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③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第356——363页。

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一些信仰蛇的氏族部落并不一定就以蛇为其图腾。但蛇信仰主要产生于南方地区的民族当中，却是很有可能的。

在中国南方民族的青铜文化中，已经有比较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蛇信仰的产生与确立。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既有龙的形象，也有不少蛇的形象，在这里龙与蛇已经各有其形态，可以说完全已经定型。其中，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3件青铜铸造的蛇，头部扁平，牙齿外露，身躯细长，大眼圆睁，躯干上布满细而密的菱形纹饰，已完全是写实性的蛇形象。这3件青铜蛇与其它青铜器一道被埋藏在祭祀坑中，表明它们是古代蜀人用于祭祀活动的重器之一，也是古蜀人所信奉的神灵动物之一^①。二号坑中还出土有数棵高大的青铜“神树”，在神树的下方，也盘绕着蛇、龙的形象。此外，从祭祀坑中还出土有青铜的“爬龙形器”，也均为龙蛇信仰的产物（图2）^②。

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更有大量蛇的形象出现，据粗略统计，具有蛇图像的青铜器不下100余件，其中有20余件是在人物或动物活动场面中被置于显要或特殊位置上，其余则作为装饰性题材出现于各种器物上面^③。

首先，可举出1956年发掘出土的石寨山第12号墓中“杀人祭铜柱贮贝器”。这件器物器体为圆桶形，在器盖上铸有杀人祭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③ 黄美椿：《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的蛇图像试释》，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铜柱的场面，除去残缺者，尚存人物 127 个，人高 3—6 厘米，为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盖上一长方形的楼房，高 17.5 厘米，楼上中央坐一女主人，楼下周围有各种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子后面立有一圆铜柱，柱上端已残，现存部分高 6 厘米，柱身上蟠着一条巨蛇，口内吞吃一人，其人的上身还露在蛇口之外。其余人物形象中，有一女子手持长蛇，面对一孔雀而立，正在以蛇饲哺孔雀^①。

1955 年发掘出土的石寨山第 1 号墓中，也出有一件“杀人祭铜柱贮贝器”，器形为铜鼓形，腰部刻划有狩猎人物图像，器盖上铸出杀人祭祀的场面。作为祭祀牺牲品，在盖中央高约 9 厘米的圆柱前面，缚着一个双手反绑的裸体女子，而柱上则盘绕着两条蛇，柱顶上立有一虎^②。

此外，1956 年发掘出土的石寨山第 20 号墓中，出有一件“杀人祭铜鼓贮贝器”，器高 30 厘米，口径 32 厘米，器盖上铸有 34 名人物，另有马、牛、狗等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盖子的中央，用三口铜鼓架成一柱，上面绕盘着大蛇，旁边立有作为牺牲而绑缚起来的男性奴隶^③。

石寨山出土的其它一些器物上，蛇也显然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处在被尊崇的地位。如 6 号墓中所出的“五人缚牛镂花铜饰物”，五人缚一牛于圆柱上，预备杀牛祭祀，圆柱的顶上，盘

①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 年，黑白图第 73。

②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 年，黑白图第 73。

③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黑白图第 74。

绕着一条大蛇，昂首而视^①。6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铸屋宇，系用巨木树起来的二层干栏式建筑，在下层的正面中央，树起一长梯，梯子上面盘绕着一条蛇^②。7号墓出土的兵器中，有一件蛇形柄铜剑，剑身细长，长31.5厘米，柄部做成蛇形，通体铸出蛇鳞，头部硕大而扁平，从大张的口中露出蛇牙，形象十分逼真^③。此外，在石寨山第6号墓中还出土了玉衣片与黄金做成的“滇王之印”^④，按照汉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君主册封的惯例，赐封金印与玉衣已是最高的品级，令人注目的是，这件金印的纽部也铸成蛇形钮。关于蛇纽印的问题，日本考古学者国分直一、高仓洋彰诸氏曾对此作过十分详尽的研究^⑤，他们的意见笔者将在后文中论及。这里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滇王国蛇纽金印的出土，至少反映两个方面问题：其一，滇王国的君长以蛇作为崇拜信仰对象，认同其为一种象征权力的标志；其二，汉王朝的正统意识中，也同样认同“滇”是以蛇为信仰对象的民族，所以赐以蛇纽金印，以区别于其它的少数民族。联系到《东观汉记》卷12《梁冀传》云：“永昌太守铸黄金蛇献之冀，益州刺史种嵩发其事”这一记载，当时在滇王国蛇这一形象肯定具有特殊的意义，受到特别地尊崇。

对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如此众多的蛇图像，曾引起部分中国学者的注意，对此作出过一些考释。其主要的观点，一是“图腾说”，二是“土地说”，三是“水神”说。对于图腾

①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黑白图第77。

②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黑白图第80。

③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图第63。

④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省博物馆》，第166—167页。

⑤ 参见高仓洋彰：《金印国家の时代》，青木书店，1995年。

说，冯汉骥先生早年已经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因为若以蛇为滇人的图腾，在许多有蛇的祭祀图像中，则为一种‘祭图腾’或‘祭’祖先的祭祀了，其意义已经不大；而对于其它踏蛇的图像则就无法解释了”^①。他认为，蛇在滇族中，应系一种“土地”的象征物：

在古代和原始民族中以蛇象征“地”、“蕃殖力”、“女性”或者“阴司”等等，是常见的，特别是在温带地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在春天万物发生时蛇就开始活动了，到冬天植物枯槁时蛇亦入地而蛰了，所以人们往往以蛇来象征“地的蕃殖力”。例如印度的地力蕃殖女神 Ellamma 或其化身 Matange，均附以蛇的象征。再者，因蛇出入于地中，故蛇往往具有与“地府”（chthonic）有关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原始的神话和传说中，蛇又往往与女性相联系。不过从石寨山发现的各种实物中观之，“蛇”可能与“地”或“地的蕃殖力”有关，故在农业祭祀中，往往以之作象征。又因为其为“地”的象征，故在各种图案中，人物和动物往往皆踏于蛇身之上^②。

近年来黄美椿则提出，滇文化中不存在蛇图腾崇拜，蛇亦并非完全象征土地，蛇的图象主要是水神，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出现的以蛇为尊的祭祀场面，应为祭“水神”或者“祭龙神”之类

①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考古》1963年第6期。

②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考古》1963年第6期。

的祭祀活动^①。

笔者认为，上述诸说中，“图腾说”显然无法比较合理的解释被人或动物踏在足下的蛇图像，也无法解释贮贝器上一女子手持一蛇以饲孔雀的情景，因为崇拜某种动物并以其为图腾的滇人，不可能对本氏族或部落的神灵采取征服或者消灭的态度，这是图腾禁忌中一条最为基本的原则。而“土地说”与“水神说”则都包含有合理的成份，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从根本上来说，蛇的图像在这里应当主要反映的是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下面，让我们再比照文献典籍，作一些分析论证。

二、《山海经》与中国南方古族的蛇信仰

《山海经》这部古籍，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全书虽然仅有3万1千多字，但却包含了中国上古社会极为丰富的资料。《山海经》也是目前所见中国先秦古籍当中，保存有关蛇信仰资料最为丰富的文献，在《山海经》的各经中，都有大量关于蛇的记载，名目繁多，神奇怪异。这里，我们不妨先将各经中出现的有关“蛇”或蛇形神物（如蛇首、蛇面、蛇身、蛇尾、操蛇、珥蛇等诸神怪）记载的次数，作一个简略的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1：《山经》所载蛇与蛇形神物次数

南山经	蛇 2	蛇首 0	蛇面 0	蛇身 0	蛇尾 1	操、珥蛇 0
西山经	4	1			1	

^① 黄美椿：《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的蛇图像试释》，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南山经	蛇 2	蛇首 0	蛇面 0	蛇身 0	蛇尾 1	操、珥蛇 0
北山经	5			2	1	
东山经	3				1	
中山经	5					2

表 2:《海经》所载蛇与蛇形神物次数

海外南经	蛇 0	蛇首 0	蛇面 0	蛇身 0	蛇尾 0	操、珥蛇 0
海外西经	1			1		2
海外北经	1			2		2
海外东经						3
海内南经	2					
海内西经	1			1		1
海内北经				1		
海内东经	1					
大荒东经						1
大荒南经	3					1
大荒西经	1					1
大荒北经	2			3		3
海内经	2			1		1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山经》还是《海经》中，所记最丰的，是蛇的原形，如大青蛇、巴蛇、玄蛇、赤蛇、肥遗蛇、育蛇、怪蛇、虎蛇、象蛇、鸣蛇、虫蛇等，名目杂芜，表明在《山海经》成书的时代，人们对于各种类型的蛇至少已有了比较